

《臺灣社會學刊》第 72 期
2022 年 12 月，頁 117-150 【研究紀要】
10.6786/TJS.202212_(72).0003

社會學該「以批判為己任」嗎？危機、 典範與挑戰：以法國社會學發展為例

陳逸淳

117

社會學該「以批判為己任」嗎？危機、典範與挑戰

感謝幾位匿名審查人的意見，使本文有了更好的品質。筆者尤其衷心感謝前後兩屆編委會，學術服務工作著實辛苦，謝謝主編與各位編委的付出！

※收稿日期：2022.04.21 接受刊登：2023.04.06

陳逸淳(✉)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通訊地址：406035臺中市北屯區遼寧路一段36號12樓之2

Email：chenyichun@thu.edu.tw

摘 要

儘管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的「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critical sociology / sociologie critique)在當代法國社會學界已取得重大成就，也成為今日舉世公認的當代法國社會學典範，然而若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其社會學並非法國社會學的傳統。由於1968年5月學運，引發了法國的「社會學的危機」，才使法國社會學出現了批判取向的社會學的發展，可以說是時代才創造了思想。布赫迪厄結合了批判與反思(reflexivity)的研究策略，將社會學定位為一種「格鬥技」。批判做為社會學研究的主要任務，這樣的取向無疑在20世紀的法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布赫迪厄的重要弟子之一博東斯基(Luc Boltanski)卻選擇了一條與其師對立的道路，他除了批判布赫迪厄的社會學，也發展自己的「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critique / sociologie de la critique)。博東斯基反對「場域」、「慣習」等社會決定論傾向的概念，他認為行動者具備其自由意志，且行動具備了正當化其自由意志的可能性。因此，博東斯基的「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所關心的則是「批判的可能性條件」以及「批判所導致的後果」，也就是「批判如何可能」的問題。他對批判的反省，亦展現了社會學典範轉移的企圖；而這樣的企圖仍具其局限。

關鍵詞：社會學的危機、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布赫迪厄、博東斯基

Should Sociology be Critical? Crises, Paradigms and Challenges in French Sociology

Yi-Chun Che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unghai University

Pierre Bourdieu's critical sociology is recognized for describing contemporary French sociology, but despite its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terms of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raditionally it has not been accepted as an evident model. The May 1968 social movement is viewed as the trigger of a French sociological crisis that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sociology, which has achieved great success in determining the main tasks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However, Luc Boltanski chose a different path from Bourdieu, one now known as the "sociology of critique." According to this theory, social actors have free will that is legitimized by their actions. Boltanski's approach is concerned with 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 and consequence—that is, the question of how social critique can be made possible.

Keywords: Sociological crisis, Critical sociology, Bourdieu, Boltanski

一、問題意識及其緣起

社會學這門學科往往給人具有批判能力的印象；從社會學三大家之首的馬克思開始，一直到後來的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批判」一直以來都是社會學引以為傲的學科代表精神之一。20世紀德國法蘭克福學派所發展出來的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 / Kritische Theorie）典範，無疑也是當代社會學最重要的典範，乃至於今日西方高等教育強調的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也成為當代人文學科的必要能力。「批判」一詞在當代，似乎已如同呼吸一般，儼然成為當代社會學、乃至於所有人文暨社會科學的基本核心價值之一。

儘管對今日的社會學學徒而言，「批判」已近乎成為當代社會學的常識之一，且不可諱言的是，年輕的社會學學子們大多都是受到社會學的批判特質的吸引而進入社會學的世界。然而，在價值與規範層面上，「批判」就應該如此順理成章地成為社會學這門學科本身固有的任務嗎？面對這個問題，如果答案為「是」，那麼「批判」究竟又是為什麼、如何得以成為社會學的任務的呢？

本研究首先希望透過知識社會學的爬梳和考察，探討在當代的法國社會學裡頭，已然深植人心的「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的形象，以及相關問題意識的脈絡。包括其建立的緣起及契機、成為社會學主流的社會與歷史因緣，以及後續的相關反思和典範轉移的企圖，希望能夠描繪出在當代法國社會學的知識框架中，關於「『批判』做為社會學的任務」，其背後的整體輪廓、相關爭議與論戰，以及晚近的社會學典範轉移的企圖為何。

二、法國社會學的初次轉折：社會學的危機

儘管當代法國社會學所擁有的批判形象在今天似乎深植人心，然而這樣的形象並非自然而然。自涂爾幹以降，法國社會學的基礎和傳承，是以社會調查和統計學為基礎的「實證社會學」為主流；儘管法國社會學發展至今堪稱多元且百家爭鳴，但實證社會學已然成為某種社會學的「科學精神」的象徵。然而這樣的法國實證社會學傳統，在 20 世紀前半葉，卻曾遭遇到與社會學這門學科的正當性有關的挑戰，其中包括以下這幾個方面：

首先，在法國社會學宗師涂爾幹逝世之後，當時仍如日中天的涂爾幹社會學派（Durkheimian school of sociology）除了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嚴重打擊，且主要繼承者、同時也是涂爾幹的姪子莫斯（Marcel Mauss），則將涂爾幹學派的研究方向從原本的實證社會學，逐漸轉往了民族學與人類學的方向。

由於莫斯本人對於社會學抱持些許遲疑的態度，甚至認為涂爾幹所追求的實證社會學並不時髦（bien peu en vogue）（Mauss 1928: 506; Helibron 2007: 329），身為當時法國社會學的代表人物，卻轉往了人類學的道路。¹

1 筆者在此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莫斯的人類學轉向不僅是制度面上的事實，也達到了涂爾幹所未能企及的成果。儘管涂爾幹於其學術生涯晚期也的確有明顯的人類學轉向，但不論是在制度面或象徵面上，莫斯的人類學轉向顯然比涂爾幹更為受到肯認，甚至可以說，正是莫斯才創建了當代法國的人類學這門學科。眾所皆知，莫斯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莫過於他成為法蘭西公學苑史上第一位「社會學講座」（1931-1942），他的當選被視為社會學這門學科在法國學術界終於獲得正式承認的重要象徵；相較之下，涂爾幹僅被提名為社會哲學講座候選人，且終未獲選。然而莫斯實際的作為卻走往了民族與人類學的方向；1925 年莫斯創辦了巴黎大學民族學院（L'Institut d'ethnologie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且由於長年與人類學家弗雷澤（James Frazer）和泰勒（Edward Tylor）等人交流，莫斯早已將人類學做為其研究重點，而非涂爾幹式的社會學研究。甚至在莫斯 1930 年獲選為法蘭西公學苑講座之前，學苑內部曾激辯究竟該任命莫斯為社會學講座，還是民族學講座（Fournier 1996: 160-165），因為若以研究成果來說，莫斯無疑捨棄了社會學而轉往了民族學與人類學的道路。莫斯過世後，當代結構人類學巨擘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協助編纂莫斯之文稿，集結出版為《社會學與人類學》（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一書；李維史陀除了親自為此書作序（Lévi-Strauss 1950），也將莫斯視為結構人類學的先驅。之後，莫斯便被普遍視為法國人類學之父（Gras 2003）。儘管本文無意在此論證究竟是涂爾幹還是莫斯的人類學轉向較為重要，但仍希望藉此釐清此人類學轉向的時代軌跡。

第二，實證社會學從這個階段起，開始處於瓶頸階段，並無進一步的突破性發展。布赫迪厄在 1985 年的一段關於知識社會學的口述歷史訪談中指出：在這段期間，法國只存在著平庸的實證社會學而已，相關的研究既缺乏理論上的啟發，也沒有經驗上的啟發，平庸的社會學研究甚至常被認為是「社會學家這種負面職業的產物」（Bourdieu 1987: 13-46）。在當時也有不少人認為，只有那些在哲學的道路上遭遇到挫敗的人，才會被遣送到社會學的領域。

第三，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一直到 1945 年終戰之間，由於戰亂之故，學者過世流失者眾，社會學這門學科的發展處於停滯狀態。

由於上述這些因素，法國的社會學這門學科，在這段期間可說是處於其發展史上最低潮的時期，且其在整體人文科學之中處於十分尷尬、不上不下的地位；儘管獲得了知識界的承認，卻被普遍認為是較差的學科。此階段為法國社會學的第一次危機，社會學處於平庸化、被視為不入流的次等學科地位。

三、從社會學的振興到社會學的第二次危機

從 1950 年代開始，社會學在過去被視為不入流的次等學科這樣的情況漸漸開始有所轉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之後，新一代的重要社會學家在此時段相繼崛起。首先，引介韋伯的歷史社會學方法、曾於 1955 年出版《知識分子的鴉片》（*The Opium of the Intellectuals / L'Opium des intellectuels*）（Aron 1955）一書的雷蒙·阿宏（Raymond Aron, 1905-1983），透過其歷史社會學的階級分析，除了在政治上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神話與納粹的國族極權主義之外，更遵循韋伯的主張，認為知識分子應採價

值中立的態度，而法國社會應朝向溫和的自由主義發展。在阿宏獲選為法蘭西公學苑社會學與現代文明講座教授之後，法國的社會學發展於焉有了新的領導人物。伴隨著全新社會學典範的出現，接下來數十年的法國社會學於是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多元繁盛的全新風貌。像是提出「行動者社會學」的亞蘭·杜漢（Alain Touraine, 1925-）、研究組織社會學的米歇爾·夸齊耶（Michel Crozier, 1922-2013）、提倡個體主義方法論的雷蒙·布東（Raymond Boudon, 1934-2013），以及當代法國「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²之宗師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等人。

如果我們可以說，法國當代的社會學發展，從傳統的、具濃厚涂爾幹學派實證主義色彩的「分析社會學」為首，轉而朝向「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的發展為首之新興典範，其實與1968年5月法國所爆發的舉世聞名的「68學運」有關（Brohm 2004: 71）。

面對這場堪稱法國近代史上最為激烈的社會革命，法國社會學家之間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一端是就讀社會學的年輕學徒們，也就是各大學社會學系的在學學生們，不論是學運領袖還是參與者，社會系的學生們扮演了68學運中最關鍵、最熱烈投入從事運動的鬥士角色。然而，與這些社會學的年輕學徒們對這場運動的參與與熱情投入相對照，這樣的熱情顯然並非當時擔任大學教授的社會學家們的共同態度（Coenen-Huther 2000: 89）。事實可能相反：重要的社會學家們，有許多人對於這場運動抱持高度懷疑、觀察、甚至於公開反對的態度。例如，當時在社會學界如日中天、擔任法蘭西公學苑現代文明化社會學講座教

2 “critical sociology / sociologie critique” 法文直接的原意為「批判社會學」。但由於中文語境容易與本文後半段的另一個相對應的概念“sociology of critique / sociologie de la critique”（法文原意為「批判的社會學」）混淆。故本文採用意譯的方式處理：前者譯為「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後者譯為「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

授的阿宏，就將這場革命視為是危險的（Aron 1968: 183）。另一位聲譽同樣卓越的社會學家布東，則將這場運動視為在高教競爭中遭到挫折的學生們的孤注一擲；布東指出，一群原本對高等教育抱持希望，但實際上在市場中卻難以獲得原本期待的報酬的年輕社會學學徒們，將這場社會運動視為他們的另一個可能獲得成功的市場（Boudon 1979: 60-69, 1990: 89-103; Coenen-Huther 2000: 89）。

布東在 1968 年學運發生後的第三年，也就是 1971 年，出版了《社會學的危機》（*The Crisis in Sociology / La crise de la sociologie*）一書。布東認為，1968 年的這場學運，所帶來的不僅僅是法國大學的危機，也是社會的危機，更是社會學這門學科的正當性危機。這場危機對於當時的社會學這門學科，提出了十足深刻的質問與挑戰。自 1968 年 5 月學運開始之後，許多的社會學家，不論是在私底下或者是在公開的場合，都有了十足充分的理由，必須深刻地去思考「社會學是否遭遇到了危機」這個問題（Boudon 1971: 9, 1980）。所謂的「社會學的危機」指的是，在這場學運中，充斥著以 1964 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沙特（Jean-Paul Sartre）為首的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的影子，並且與馬克思主義、反資本主義、反結構主義、反政府甚至是無政府主義的陣營的各種思想結合在一塊。布東殘酷且直白地指出，在 1968 年學運過後，到了 1970 年代之後，隨著運動的沉澱，人們對於「解放」（emancipation）的幻想逐漸消失，同時社會學也逐漸失去了其學科的聲譽。在象徵上，社會學過去乃憑藉著某種人們對其抱持著批判與改變世界的幻想，而得以維持其聲譽，即認為以馬克思主義為依歸的批判社會學可以帶來世界的解放。在實際上，由於一系列的社會學界的內部鬥爭，以及人們對社會學日益增生的懷疑，社會學的學科地位於是在此時開始嚴重地遭到弱化（Boudon and Bourricaud 2002: VI; Brohm 2004: 71）。這

樣的危機不僅僅是社會學圈子內的自我認同危機，更是社會學學科正當性的危機。

然而，為什麼當時的法國社會學，會遭遇到如此重大的危機呢？布東指出，上述「社會學的危機」，顯示出社會學這門學科的發展遭遇到下列幾個重大的問題（Boudon 1971: 9-22），且這些危機並不限於法國的社會學界，而是超越國境和語言的，是社會學這門學科所遭遇的整體知識框架的問題：一、社會學一直未能明確地定義其對象；且做為一門「科學」，其對象卻難以透過實驗來控制。二、社會學這門學科內部包涵了高度的異質性，裡頭包括了論述性的研究、描述性的調查、思辨性質的理論研究、分析性質的理論研究等等；此外，微觀社會學和鉅觀社會學的拮抗，也使得學科內部的對立一直持續著。在研究方法方面，某些社會學家強調嚴謹的觀察和精確的語言定義，某些社會學家則採取申論式的寫作（essayism / essayisme）。這些不同研究方法之間的異質性不僅難以調解，甚至還充斥著矛盾、衝突與相互之間的蔑視、對抗和不理解。三、布東指出，社會學擺盪於「描述」（description）（即事實陳述）和「解釋」（explication）（即規範／價值陳述）這二者之間（Boudon 1971: 12）。³ 他認為社會學無疑是一門律則的科學（science nomothétique）。然而，社會學的獨特性在於，既進行「描述」，但也進行「解釋」，二者之間往往接續著進行，通常是先進行事實之描述，再進行解釋；然而，在「描述」與「解釋」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卻相當貧乏。例如，描述本身並不容易協助因果的解釋，甚至被認為是危險、流於武斷的；因果推論也未必是基於描述的基礎，反而經常是基於研究

3 這裡我們其實還可以繼續深究的問題是：「解釋（即所謂對事實的說明）」是否能與「規範／價值陳述」等同？例如，涂爾幹認為，對社會事實的解釋（例如：關於自殺的社會調查），必然具有指導規範與價值的取向（例如：認為自殺是社會失序的表徵）。換言之，涂爾幹認為事實與規範兩者之間是無法分離的。然而，與涂爾幹不同，德國社會學大師韋伯則認為社會學研究必須盡可能地區分事實陳述與價值陳述。不過，布東在該書中並未明確表達自己的立場，而是將此弔詭描述為當時社會學遭遇學科正當性危機的其中一個原因。

者個人的價值觀和關懷。然而社會學家們卻不只是想要進行描述而已，經常還希望尋求具普遍性的因果解釋。儘管具備這樣的野心，布東卻認為，社會學企圖尋找普遍性的社會法則注定是徒勞無功的。另一方面，由於社會學一直致力於發展各種用於分析的理論（analytical theories / théories analytiques），並以此尋求現象的原因，然而弔詭之處在於：如果社會學要達成有效的分析，就必須先尋求隔離出其中一些抽象的個別現象，藉以建構其研究的對象，而不應該以掌握現象的總體性為目標。如此一來，困難之處便在於，社會學研究的個別對象必須是從真實之中切割獨立而來，然而這些對象無法透過抽象總體性宣稱來建構。⁴ 四、上述的抽象建構之所以困難，乃是由於社會學不論其研究主題、內容，或者是其形式（取向、研究方法、學術語言），都依賴於真實的社會，難以被抽象地建構出來。

面對上述「社會學的危機」，布東也指出，社會學界也嘗試發展出下列四種回應此危機的方式（Boudon 1971: 23-31）：一、試圖去擊劃出一個一般性的理論框架或典範，並試圖透過這樣的理論框架去融會、整合所有其他的社會學領域。例如莫頓（Robert K. Merton）的功能論，以及他所提倡的中層理論（theories of middle range），企圖在鉅觀和微觀社會學之間取得兼得的方法。然而，布東卻認為，這類的理論嘗試注定是徒勞的，畢竟企圖整合不同領域的社會學研究的理論典範並不少見，但事實上卻都並不成功，甚至難以說服鉅觀與微觀社會學家的任何一方。二、在某些社會學家眼中，例如法國當代的著名社會學家巴什列（Jean Baechler）⁵（Boudon 1971: 29）認為社會學所呈

4 舉例而言，「無產階級」的概念是一個總體性的理論建構，但在從事科學實證研究的時候，我們卻無法直接地掌握這個「總體」，只能透過特定的研究方法（例如抽樣），切割出部分特定的真實對象，並藉由這些真實對象來理解這個理論性的總體概念。

5 巴什列（Jean Baechler, 1937-）是社會學大師阿宏所指導的學生，先後服務於高等社會科學院（EHESS）、巴黎第四大學、巴黎第五大學、巴黎第十大學和國家科學研究院（CNRS）。

現出來的高度多樣性，僅僅顯示出社會學只是一種殘存的、冗餘的科學，巴什列甚至悲觀地認為，社會學這門學科終有一天會消失在其缺乏統一的高度異質性之中。一方面，其他特定領域的科學研究，例如人口學，將會逐漸地占據目前社會學的部分研究對象，進而取代社會學原本所擁有的地位。另一方面，某些具指標性的、且仍具研究養分的社會學次領域，例如組織社會學，則可能會被建構成為新的社會學主流典範，並逐漸取代過去那種充滿多樣性和異質性的社會學（Baechler 1970: 24），最終的結果則可能是組織研究取代了社會學這門學科。三、某些社會學家則採取教條式的回應，強調社會學儘管確實充滿了異質與多樣性，但卻仍然具備基礎上的統一，並在此統一的基礎上能夠共同處理某些特定的問題；例如現代性的問題、資本主義的問題、社會不平等的問題等等；然而，這樣的看法，卻仍難以對社會學這門學科在現實世界中所遭遇到邊緣化與不信任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舉例來說，儘管一些社會學家擅長分析社會不平等，但卻無力甚或是無意改變現狀。四、最後，其中一些社會學家，例如布赫迪厄，則決定採取批判的立場，主張社會學家必須透過批判來回應上述「社會學的危機」。而這也就是所謂的「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的立場。布東認為，「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的基礎在於**對社會學這門學科所抱持的信仰**（belief / croyance）。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主張，若要化解社會學的危機，「批判」就是必要的策略，這其中當然也包括了**對社會學本身的批判**，例如對社會學語言的批判性的分析，也就是所謂的社會學「反思」（或譯「反身性」）（reflexivity）。

面對 1968 年學運所帶來的社會氛圍與挑戰，社會學這門學科為了避免變成某種教條式的幻想或整體論的神化（例如：涂爾幹學派以及美國的結構功能論對社會秩序的描述與憧憬），進而成為學究式、象牙塔的、封閉且自圓其說的學科，**社會學於是必**

須選擇批判，成為批判者，特別是必須對既有的社會學理論進行批判（Brohm 2004: 71）。

四、「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之典範樹立： 揭露策略與實證分析的結合

在這場社會運動之中，在當時才剛剛開始發跡的布赫迪厄，則位處於一個十分尷尬的位置；他與巴瑟宏（Jean-Claude Passeron）合著的成名之作《繼承人》（*The Inheritors / Les héritiers*）（Bourdieu and Passeron 1964）和《再生產》（*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 La reproduction*）（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0），這兩本書被社會學的青年學徒們和 68 學運的運動者廣泛流傳，並且被當作批判當時的法國社會不公不義的重要依據；布赫迪厄和巴瑟宏也因此被學運的運動者們視為某種學術層面上的精神導師（Audier 2009: 245-253）。然而弔詭的是，布赫迪厄本人對於 1968 年學運的態度卻是否定的，甚至是嗤之以鼻的，他本人曾經十分清楚地表明道：「1968 年學運是一場假的革命（false revolution / fausse révolution），它製造了真正的恐慌，但卻什麼都沒能改變」，甚至曾經在公開場合直接訓斥參與 68 學運的運動者：「你們瘋了！」（Audier 2009: 247）此外，根據布赫迪厄在《繼承人》和《再生產》裡頭的研究，他認為 1968 年的這場學運之根本發生原因，很有可能是因為高等教育文憑的貶值（Passeron 1982: 551-584）。那些來自於布爾喬亞家庭的學生，當他們發現再也無法透過取得文憑來進行有效的階級複製的時候，特別是對於那些就讀文科的學生而言更是如此，這樣的現實狀況便是令青年學子們難以接受的（Gruel 2004: 17-21）。

布赫迪厄認為社會學家首先必須對於那些「即時知識的幻覺」(the illusion of immediate knowledge / l'illusion du savoir immédiat) 和「自發的社會學」(spontaneous sociology / sociologie spontanée)⁶ 具備「認識論上的警覺」(Bourdieu et al. 1968: 27)。在技術上，則使用科學的**統計方法**，來對一般性的語言進行邏輯上與詞彙學上的批判 (Bourdieu et al. 1968: 28)；透過這樣的**批判**，社會學於是能夠去釐清各種看起來理所當然的概念其背後的預設及其後果。

布赫迪厄的這套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的方法論，其應用幾乎遍及他畢生的所有重要研究成果。對「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而言，一切看起來「自然而然」的事物，實際上只不過是長時間的社會過程的結果。

於是，對抗這些象徵上的「自然而然」和「自發的社會學」，這樣的知識關懷也就貫串了布赫迪厄的學術研究。因為一切看似自然化的社會關係，其實就是社會中的各種宰制關係。從政治、階級、性別、藝術、文化到反對新自由主義，布赫迪厄無所不包的研究，皆透過反思的科學分析 (Bourdieu 2001: 173-1183)，去揭露一切象徵秩序之中的宰制與被宰制的關係。於是布赫迪厄在今日的法國學術界，被視為當代法國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的代表人物 (Accardo 2006; Bensaïd 2002; Corcuff 2003: 233-244; De Munck 2011; Mauger 2002)。其批判取向的研究，除了將社會學定義為一門格鬥技 (martial art / sport de combat) (Carle 2001) 之外，布赫迪厄也將社會學的任務賦予為：持續不斷地在各個不同的場域之中，例如教育場域、經濟場域等，去對抗自然主義的幻象 (naturalist illusion / illusion naturaliste)，去對抗那些被定義為自然而然、不可質疑的宰制規範 (Frère

6 「自發的社會學」指的是將社會視為自然而然地發展的結果。認為社會發展不受意識型態、階級不平等因素之影響，而是自然演化的結果。

2008)。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有別於「批判理論」在德國的長久發展至今，「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在法國社會學的發展史中，似乎是個獨樹一格的異類。除了布赫迪厄與其徒孫，至今並未有其他法國社會學名家把「批判」看作是社會學的重要任務。如果我們爬梳一下法國社會學發展史，社會學的奠基者涂爾幹 (Émile Durkheim) 繼承了孔德 (Auguste Comte) 的思想，努力將社會學建立成為一門實證科學 (Aron 1989: 224)，主張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既有的「社會事實」(social fact / fait social)。主張實證主義的、描述性質的、科學式的分析社會學 (analytical sociology / sociologie analytique) (Bronner and Géhin 2017: 51-53)，以及後續往英語世界傳播所滋養出的美國「結構功能論」(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的理論立場，卻也使得實證社會學經常被批評者冠上「為現狀辯護」的負面標籤。涂爾幹的學說，以及其以降的涂爾幹學派社會學，也因此被貼上「缺乏批判精神」、「為既有秩序辯護」等保守標籤 (Leroux 1998: 158-159)。布赫迪厄做為阿宏的學生之一，由於其批判性十足的問題意識和研究取向，使他十分不受到阿宏的喜愛。相較之下，與布赫迪厄競爭法蘭西公學苑的社會學講座教授位置的布東，由於著重於社會行動的科學分析，似乎更加符合涂爾幹以降的法國社會學傳統。我們也許可以這麼說，布赫迪厄的「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在法國社會學的發展歷程中，似乎是個「異類」，除了布赫迪厄與其徒孫之外，幾乎沒有人將「批判」當作社會學的任務。

五、三階段社會批判的典範建立：教育社會學、文化社會學、國家社會學

布赫迪厄在 1997 年出版的《巴斯卡式的沉思》(*Pascalian Meditations / Les méditations pascaliennes*) 一書裡頭，標示出了自己一生的研究軌跡。他說，自己首先從事的是「教育社會學」，然後是「文化生產的社會學」，最後則是「國家社會學」(Bourdieu 1997: 356)。

在第一個階段的「教育社會學」研究，最具代表性的無疑是我們先前提到的《繼承人》和《再生產》這兩本書；不過到了 1989 年，布赫迪厄又出版了其教育社會學的延續性暨總結性研究：《國家貴族：高等學院與群體精神》(*State Nobility: Elite Schools in the Field of Power / La Noblesse d'État. Grandes écoles et esprit de corps*) (Bourdieu 1989)。《國家貴族》一書採用了以前述的社會空間模型為基礎的統計技術，分析了全法國的高等教育體系之菁英匯聚地，也就是各個不同領域中高度競爭且獨立招生的「高等學院」；這些高等學院如何反覆地生產出一批又一批的菁英，以及這些出自高等學院的一小撮菁英們，如何成為法國這個國家的現代貴族階級，並且如何反覆地再生產來自於同樣一小群人的菁英，而這些所謂的菁英，又如何代表了當代法國的群體精神？人們如何、為何崇拜菁英、期待菁英，寄希望於這群現代國家的貴族階級？法國雖以「平等」為其三大立國精神之一，但諷刺的是，實際上統治法國的人，卻是一小群菁英循著既定的道路，反覆生產出同樣的群體，並成為法國社會中的統治階級。以政治菁英為例，法國的高級文官幾乎全都是循著相同的路徑生產出來的成品：一流高中畢業後，憑優異成績進入競爭激烈的巴黎政治學院 (IEP de Paris) 預備班 (preparatory classes / classes préparatoires) 就讀一年，再經歷激烈的競爭後，勝出者始能獲

得入學資格；順利從巴黎政治學院畢業之後，接著再經歷激烈競爭，進入國家行政學院（ENA）深造，畢業後進入文官體系歷練，或者投入政黨政治與民主選舉。法國第五共和歷屆元首，除了軍人出身的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之外，全部都是循相同的模式產生出來的類似成品。然而，正如《繼承人》和《再生產》的分析所指出的，高等教育在實際上並非促進階級流動的有效工具；正好相反，教育體系一直都是確保階級能夠反覆地再生產出類似體系的體系（Bourdieu and Passeron 1964, 1970）。布赫迪厄的教育社會學研究，以及其中所提出的許多觀點，對 20 世紀全球的教育社會學研究無疑發揮了至深至遠的影響力。

在文化生產的社會學研究方面，除了他聞名全球的代表性著作《區隔》（*Distinction / La distinction*）（Bourdieu 1979）一書之外，從其研究生涯的早期開始，就展現了他對於「藝術社會學」的高度興趣，例如 1965 年出版的《中等藝術：論攝影的社會用途》（*Photography: A Middle-brow Art / Un Art moyen. Essai sur les usages sociaux de la photographie*），透過大量的訪談調查，去探討分析攝影這種獨特的文化實作之中所具有的社會階級意涵。其研究成果發現：中產階級對「攝影是一種藝術」這樣的看法有最高的認同；上層階級則較傾向於認為攝影是次等的創作方式；普羅大眾階級則將攝影賦予某種工具性意義，遠多於藝術方面的象徵意義（Bourdieu et al. 1965）。1966 年出版的《藝術之愛：美術館及其公眾》（*The Love of Art: European Art Museums and Their Public / L'Amour de l'art. Les Musées et leur public*）（Bourdieu and Darbel 1966）調查了全歐洲的美術館的參觀者的社會構成，結果發現：「參觀美術館」這個活動具有十分明顯的社會階級意涵，進行這項活動的頻率，會隨著參觀者的階級地位下降而遞減；然而更耐人尋味的是，造成此階級區隔的原因並非經濟因素（例如票價太貴），而是「文化需求的不平等」：不同階

級與社會群體的出身，決定了人們文化需求的多寡；越上層階級者具有越高度的文化活動的需求，反之亦然。雖然「文化需求的不平等」源自於家庭與學校教育，然而弔詭的是，布赫迪厄認為也只有透過教育才擁有對抗文化需求的不平等的可能性。

而 1979 年出版的《區隔》一書，更於 1989 年獲得國際社會學會（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票選為 20 世紀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十本社會學著作之一，其重要性可見一斑。《區隔》這本書運用了大量的統計數據，並透過「社會空間」的技術來呈現特定場域內的不同位置的分布狀態；透過位置與位置之間的相互關係，於是便能夠將社會空間中佔據不同位置的社會群體進行分類。該空間由雙軸的多向度幾何分析所建構而成。在社會空間的視覺化統計模型之中，縱軸代表了「資本總量」的多寡，包含了所有類型的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經濟資本）的總和。橫軸則呈現出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的多寡，越靠近右側代表經濟資本越多，越靠近左側則代表文化資本越多。在社會空間裡頭，不同的社會群體持續進行以區隔和秀異為目的之鬥爭；為了標示出區隔，一些微弱的差異會被社會群體進一步轉化為明確的差異。布赫迪厄認為，在每個特定場域之中的每一個社會群體，都會進行某些特定的實作，展現出某些特定的「生活風格」；藉由這些生活風格，於是便能夠清楚標示出與其他社會群體的區別。諸如飲食、居家裝潢、個人穿著、音樂欣賞、從事的娛樂活動、偏好的運動類型等，諸如此類，一切的生活風格其實都具有某種區隔力。

除了學術研究之外，到了布赫迪厄最晚年，約莫 1990 年代起，他開始積極投入第一線的社會運動、撰寫大量的社論文章抨擊政府，帶領對抗新自由主義的擴張。從對電視媒體的批判，一直到支持工運、學運、對新自由主義所進行的批判，都可說是他的「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的研究路徑的具體實踐，也是他將

社會學定位為一種「戰鬥的運動」的最佳明證。

最後，在上述這些研究與實踐的工作之中，由於其論述與直接對抗的對象，經常牽涉到與政府和國家有關的議題，也因此，布赫迪厄在其學術生涯晚期，開始著手針對「國家」進行理論的研究工作。《論國家》(*On the State: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89-1992 / Sur l'État*) (Bourdieu 2012) 出版於 2012 年，是布赫迪厄於 1989 年到 1992 年間，在法蘭西公學苑所進行的公開講座的内容，企圖為他過去堪稱龐雜且宏偉的諸多研究範疇，與「國家」這個明確的問題意識之間的錯綜複雜的關係，描繪出了整體且清晰的輪廓。在本書中，布赫迪厄致力於去揭發「國家思想」的諸多幻象；他認為，所謂的「國家思想」，乃致力於維持某種信仰，亦即要人們相信國家的存在乃傾向於去捍衛所謂的「共善」(the common good / le bien commun)。從這樣的命題出發，在這本書中，布赫迪厄以「國家生成的社會學」做為其分析的開端，分別從歷史、文學、政治、象徵、信仰、權力、法律、科學、階級等各個方面，去分析「國家」這個概念之中，所包含的種種預設與其中所牽涉的社會思想。

六、博東斯基「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對批判典範的挑戰

布赫迪厄透過以上三階段的社會批判，一手打造了當代法國「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的典範，他所指導的多名學生，也在法國社會學界陸續取得了重要的職位，在不同的研究領域各自發展。在他的徒子徒孫之中，最早展開學術生涯、發揮影響力，且走出自己的研究道路的弟子，無疑是社會學家呂克·博東斯基(Luc Boltanski)。做為布赫迪厄最早期、最重要、也最器重的學

生之一，博東斯基卻選擇了一條「反對自己的老師」的路。

博東斯基雖在其生涯早期就與其師布赫迪厄合作過不少研究，例如前面提到的《中等藝術：論攝影的社會用途》，且他於1982年所出版的重要著作《幹部：一個社會群體的形成》(*Les cadres. La formation d'un groupe social*) (Boltanski 1982)，在方法上遵循布赫迪厄的風格，採用大量的社會調查和統計分析，搭配社會空間的統計模型技術，分析幹部這個社會群體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這本書無疑是一本帶有濃厚的布赫迪厄色彩的研究，此時的博東斯基也仍然是布赫迪厄學派的成員。從1970年代起，博東斯基與布赫迪厄漸行漸遠，開始轉與拉圖(Bruno Latour)和迪侯吉耶(Alain Dérozières)等社會學家合作。1990年，博東斯基撰寫了〈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與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Sociologie critique et sociologie de la critique*) (Boltanski 1990)一文，裡頭清楚地展現出博東斯基想帶領當代法國社會學進行典範轉型的企圖。到了1999年，他與艾芙·夏佩洛(*Ève Chiapello*)所合寫的成名之作《資本主義的新精神》(*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 Le nouvel esprit du capitalisme*) (Boltanski and Chiapello 1999)成為他另闢蹊徑、走出一條自己的學術道路的最重要開端。在這本書中，他企圖重新反省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所慣用的社會批判的套路。

他分析了當今的資本主義體系為了回應左派知識分子與運動分子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所發展出的各種「新精神」，包括對生產過程的異化的批判的回應。他主張，「資本主義的歷史」正好與「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的歷史」一樣古老，「批判」本身與「資本主義體系的變遷與成長」乃是齊頭並進的。舉例而言，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為了回應社會行動者對更多的自主權的要求，當今的資本主義體系的運作與工業革命時代相比，早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於馬克思主義與批判取向的社會學，在過去百年來對

於「異化」(alienation)的強力批判，故今日我們所看到的「資本主義的新精神」早已實質放棄了過去工業革命時代、上對下的嚴格管制，轉而強調個體員工的工作彈性、參與公司治理，以及以個體責任感為訴求的、自我監控式的自主管理。具體的發展趨勢諸如彈性化的工時、彈性薪資、論功行賞制(meritocracy)、工會角色的弱化等等。此外，資本主義體系也迂迴地回應了馬克思主義對勞動成果商品化、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的批判，今日的資本主義發展越來越仰賴金融市場之中的資本流動性，而非商品或勞動力的流動性；全球化的發展也從商品的全球化，轉往金融市場的全球化發展，資本的流動性已然成為當今的資本主義體系發展的主要動力來源。為了對應金融與信用市場的資本需求，從國家、公司到個體的行動模式，都出現了深刻的轉變。過去的社會學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其在今日之適用性也已經降低了許多。博東斯基認為，資本主義體系為了回應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會持續地重新布署；因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本身，同時也成為資本主義得以持續發展的一部分。

博東斯基在此區分了兩種不同類型的批判：社會批判(social critique)和藝術批判(artistic critique)(Boltanski and Chiapello 1999: 241-285)。所謂「社會批判」是基於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運動所出發的古典批判類型，在20世紀前半葉以前的工人運動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其整體目的在於譴責「異化」，以及資本主義在工作和社會生活中造成苦難和不平等，個人主義式的競爭及其所帶來的種種限制和壓迫。博東斯基認為，「社會批判」的論點長期以來主導著社會學這門學科的觀點和走向，甚至成為某種社會學這門學科所自我賦予的任務。例如前述布赫迪厄的「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批判社會不平等和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弊端，也就是當代社會學所慣用的「社會批判」的範例。

而另一種批判，即所謂的「藝術批判」，路徑則部分地延續了法蘭克福學派對於文化工業、藝術創作與大眾媒體的批判。博東斯基指出，當代的藝術批判主要興起於1968年5月學運之後，其主要的批判對象是資本主義和官僚制在當代的日常生活中所帶來的壓迫和麻木。藝術批判揭露了資本主義做為一種日常生活中無所不在的壓迫，對於人的主體性、創造力和自由造成破壞。獨立自由的創造力是當代個人主義的基礎，但在資本主義中，創造力已經遭到體制所扼殺。舉例而言，今天的文化生產、藝術創作與藝術評論，大多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所服務，廣義的大眾媒體亦然。

有了上述對於「批判」的反省基礎，到了2009年，博東斯基進一步出版了《批判：解放的社會學》(*On Critique: A Sociology of Emancipation / De la critique. Précis de sociologie de l'émancipation*) (Boltanski 2009) 這本重量級著作，引發法國社會學界的大量關注與討論。這本書可說是他在《資本主義的新精神》一書之後，最受到矚目的作品。他希望能夠深刻地回應以下這一個關於「批判」與「社會學」兩者之間的關係的問題：

社會學是否應該為批判服務？如果是的話，社會學又該如何在「描述」與「批判」兩者之間取得兼容？如果對今天的社會學這門學科而言，批判是正當的，那麼，究竟是在怎麼樣的脈絡與可能性條件之下，批判才得以被認為是正當的？自此，博東斯基對布赫迪厄的「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這個當代法國社會學的典範，提出了典範轉移的挑戰。他試圖重新評價並反思「批判」在社會學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限制，並且嘗試提出自己的「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

他首先表明了對於「批判」的疑慮：「多年來我所努力從事的工作，也就是批判的問題，以及社會學與批判兩者之間關係的

疑問，並不純然由於其理論上的吸引力而已。對我而言，這個問題無疑是我這個世代的社會學家們的普遍問題，也就是那些在1968年的5月學運前後進入社會學這個學門的人；對我們而言，這幾乎是一個生命歷程的標記。」（Boltanski 2009: 14）從個人的生命經驗出發，藉由「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博東斯基希望能夠重新建構社會學的任務。博東斯基反對布赫迪厄強調以「揭露」做為社會學的任務。相反的，博東斯基認為，社會學所仰賴的調查與研究方法，不應以從知識分子與研究者本身的價值觀所出發的批判為目標，反而更應該去重視和理解從一般的、芸芸眾生的施為者出發的「一般的譴責」（ordinary denunciations / *dénonciations ordinaires*）或「一般的批判」（ordinary criticism / *critiques ordinaires*）（Boltanski 2009: 63-64, 66, 148）。當施為者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任何覺得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處境時，其自身的正義感（*sense of justice / sens de justice*）會促使個別的施為者對於這些「不正義」進行其主觀的譴責。與從專家視角出發的「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相較，這些從一般人出發的「一般的譴責」或「一般的批判」，其實更加貼近施為者的個體利益與其個人的真實處境，且完全無須知識分子來為其代言和發聲。去分析、理解個體施為者在何種脈絡與情境之下，得以意識到「存在著不正義」一事，並對此不正義進行一般的譴責或批判、這些譴責和批判需要怎麼樣的可能性條件，這也就是博東斯基希望賦予「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的主要任務之所在。換句話說，對此「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的新興典範來說，社會學的任務並非引領批判，而是去理解這些一般的譴責與批判從何而來、如何被建構、能產生怎麼樣的效果。

在方法論方面，傳統的社會學家往往透過一整套的科學方法，包括具一定規模的社會調查與訪談，和嚴格的科學步驟，去蒐集、理解不同個體施為者的特性、脈絡，與客觀方面的條件與

限制，例如職業、年齡、收入、性別等。待蒐集資料完成之後，社會學家便展開一種由少數幾個人、甚至是獨自在其研究室中所完成的、完全無須涉入真實情境的分析。研究者藉由這些「科學步驟」撰寫學術論文或成果報告，然後宣稱自己的研究是有信度和效度的，即暗示自己的研究成果至少在此當下是能夠成立的真理。博東斯基認為，當社會學家把這樣的涂爾幹式的社會學科學實證分析的事實陳述，進一步加入某種價值判斷或宣稱，並結合了馬克思主義慣用的「批判—實踐—解放」模型，也就構成了我們在當代所看到、熟知的「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的典型模式。這樣的模式暗示了，實證主義的社會科學研究所進行的關於社會事實的陳述，同時也就使社會學研究成為價值的指引；例如，當研究發現社會存在著不平等，同時也就暗示了社會不平等是不對的、是需要透過實際行動來改變的。

在概念運用方面，博東斯基舉了布赫迪厄常用的「幻象」(illusion) (Boltanski 2009: 42, 47, 192) 這個概念做為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的概念傾向範例。傳統的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傾向於將底層的行動者視為是「被決定的」；認為底層的行動者如果沒有反抗宰制者，就是接受了某種馬克思主義所描繪的「偽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是受到意識型態 (ideology) 所決定的產物。或者是，當人們接受了由象徵暴力 (symbolic violence) 所塑造出來的各種「幻象」，就是順服、承認了某種與施為者本身的社會位置之利益不符的、某個特定場域的宰制者所定義的「真理」。博東斯基認為，類似這樣的社會學的批判觀點，往往太過輕忽了行動者本身的決定權，而且這些批判所提供的觀點，其實大都是社會學家在他的研究室中所建構出來的學究觀點。而這些社會學家所建構出來的社會學觀點，其主要的分享與溝通的對象，也僅止是其自身所屬的學術社群而已。如果我們把這些社會學專業的概念、術語放到公眾之中被檢視，「以批判

為己任的社會學」所提供的概念和價值判斷，可能就會面臨公眾的挑戰和分析的障礙。

「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則主張，社會學家透過科學方法所建構的觀點，也只不過是眾多觀點的「其中一種觀點」而已。在廣大的公眾當中，對同一事物往往充斥著高度多樣的詮釋，而且每一種詮釋都是從某一個、或某一群施為者自身的利益出發所建構而來的觀點。社會中這些高度複雜的、多樣化，甚至經常相互衝突的諸多觀點，有其各自的理由與依據，不該只是被社會學家簡化為「某個特定社會階級或群體的特定意識型態」而已。博東斯基認為，社會學不該預設某些觀點是「偏誤的」、「偽意識」、「誤認」或「特定意識型態的展現」。也因此，面對「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所提供的批判觀點，我們應該抱持高度謹慎的態度，並將之視為眾多觀點的其中一種觀點來看待，而不應將之當作某種高高在上的真理。

因此，博東斯基的「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認為，如果我們希望理解社會學家的「批判」，或者是一般人的「一般的譴責」，社會學家應該要透過同樣的科學方法，去理解溝通與實作的諸多元素，因為正是這些元素，才使得協議（accord）得以可能。例如，社會學家可以去分析，面對同一個對象或議題，不同的施為者之間的不同看法有哪些？之所以產生看法分歧，進而出現批判或譴責，並對此過程進行分析。以及，如果在批判或譴責之後，引發了不同意見之間的進一步的爭執或衝突，那麼，不同的施為者之間如何看待那些與自己不一樣的觀點？例如去探究不同的施為者是如何察覺、如何意識到自身與他者的觀點、如何承認某個特定觀點、以及如何在不同的觀點中達成協議或共識——如果協議或共識存在的話。如上所述，「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著重分析的重點在於，當所謂的「批判」出現了，那麼這些批判在不同的施為者之中的不同的效果、條件、軌跡、過程與結果分

別是什麼。

於此，博東斯基的「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與布赫迪厄的「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便有了截然不同的目的：後者的「揭露」成了前者的研究對象。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既不聚焦於施為者的慣習 (habitus)，也不太關心施為者的社經地位。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主張，每一個個別施為者都擁有各自的自由意志，施為者會努力地去證明，他自己所認知的觀點是正確的，並且會透過各種方法去正當化自己所擁有的觀點。布赫迪厄的「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以揭露無意識之下的宰制機制為己任，而博東斯基的「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則試圖去分析每一種不同的批判之所以可能的條件，以及批判之後所引發的後續效應和結果，認為每一個施為者都完全清楚、徹底理解自己的動機與利益之所在。如果一個施為者看起來似乎是「被蒙蔽的」，他們也是有意識地選擇如此。「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的任務，就在於去理解他們為何選擇如此。

此外，博東斯基也批評布赫迪厄的社會學帶有決定論的色彩 (Boltanski 2009: 41-45)，而且忽略了人們選擇批判或是不批判的個體自由意志。與「社會結構」這樣的傳統社會學概念相較，博東斯基更關心的是，個體的意志如何建構、重構社會實在。在方法上，博東斯基亦著重於實證的經驗研究。並認為做為科學的當代社會學，肩負著某種規範性的影響力，社會學家應該利用社會學的科學分析，來理解社會中的特定概念的傳播及其正面或負面的影響。

七、對批判相關概念的反思與挑戰

博東斯基也反思了社會學中常用的「宰制」(domination) (Boltanski 2009: 14-17, 32-33, 41-45, 175-176) 這個概念。他認

為，「宰制」這個概念被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用來建構其最基礎的理論架構，亦即認為社會中存在著宰制關係；階級的、性別的、種族的……諸如此類的宰制無所不在。宰制與「權力」的概念有關，透過權力的不對等，社會於是有了不平等的關係。「宰制」並不是顯而易見、直接了當地發揮作用。相反的，宰制隱身於諸多配置（dispositifs）之中，傳統的權力觀的宰制形式（軍隊、警察、法院……）只構成了最淺顯的面向而已，當代的權力分析指出，宰制的運作其實是更加隱晦、自動生產的。每個行動者由於其所身處的位置、階序等社會條件，決定了他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而且這一切看起來就像是他們自己選擇的結果。於是，**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便認定，「社會行動者順從於此宰制關係」，而且還持續再生產出這樣的宰制關係。**

也正因如此，博東斯基指出，**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傾向於「將現實描述為令人無法接受的」**（make reality unacceptable / rendre la réalité inacceptable）（Boltanski 2008），並認為每個行動者都必須為此現實負起部分責任，主張每個行動者都肩負著改變現狀的職責。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的學科正當性，仰賴於個體行動者的不滿，並試圖把「個體的不滿」描述為「普遍性的不滿」，來進一步強調「其他的現實（必然是更好的）是可能的」，鼓吹行動者透過行動去改變其對現實的不滿。於此，博東斯基指出，「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將面臨到某種「雙重局限」（double constraint / double contrainte）：錨定（anchoring / ancrage）的局限，與外部性（exteriority / extériorité）的局限（Boltanski 2009: 140-149）。

「錨定的局限」指的是，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必須將其批判以及對權力的疑慮，錨定於個體行動者的層次上，即把批判定調為個體行動者的不滿。若沒有這個「錨定於個體責任」的預設，批判就會變成一套烏托邦式的理論，僅止是對於理想世界的

整體描繪。這樣的理論傾向，使得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將知識分子、專家與一般人隔離開來，將專家的工作定位於「去指出世界『應該』是什麼模樣」，而一般人的「一般的譴責」相較之下則顯得支離破碎，既缺乏具體的理想目標，也沒有整體的面貌，顯得無足輕重。知識分子、專家站在批判與道德的制高點上，一般人若非被奴役與宰制，就是等著被知識分子與專家所啟蒙和指導。

而「外部性的局限」指的是，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不論是在描述某種理想的世界或秩序，還是在反對某種秩序，都要求行動者必須遷移到「自身所處的位置之外的位置」，因為理想總是不在此處的、尚未在此實現的東西。例如，認為一名高階幹部不可能在他的位置上理解整體，反而必須離開他的位置，才能理解秩序的全貌；或者，一名資產階級如果沒有被拋入無產階級，他也不可能理解無產階級革命的意義。抱持著這樣的社會學觀點，便總會要求社會學家必須從「自身以外的位置」來描述世界，似乎一切從自己的位置出發的主觀觀點都是武斷的，而且認定社會學家有能力拋棄這樣的武斷，然後將對外部觀點的想像（因為始終是外部的，所以必然是想像的）用以重構自身的觀點，且宣稱這就是所謂的社會學的「反思」。

八、重構批判與社會學的關聯

面對上述「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的雙重局限，博東斯基企圖在其理論架構之中，重新建構「批判」與「社會學」兩者之間的關聯，也就是他的「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他將社會實在描述為類似法庭的場景，每個行動者都處於某種「不確定」的狀態；為了排除不確定性，行動者必須進行調查，記錄自己與他

人的詮釋，並且為自己的立場與觀點提出辯護與證明（Boltanski 2009 : 48）。

這樣的理論設定，可以讓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在行動者的設定上，與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作出區隔。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中的行動者，是處於被動的被宰制者，而「解放」只能投射在烏托邦式的未來。相反的，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所設想的行動者，則是無時無刻地為自己的選擇、立場與決定進行辯護的積極的行動者。由此理論設定出發，社會世界不再是一個被動地服從於無意識的宰制關係的場所，反而更像是一個四處充斥著爭辯、批判、歧見，以及期待重建協議與秩序的社會世界。社會生活必須面對上述這種根深蒂固的不確定性，特別是當人們身處於無止盡的爭辯之中的時候，人們總是必須關注自己在這個世界裡頭到底是誰的問題，也就是認同的問題。個體若想要分析這樣的不確定性，博東斯基提供給我們兩個面向的理論分析工具：**現實**（reality / réalité）和**世界**（world / monde）。現實傾向於維持現狀、捍衛既有秩序；世界則傾向於無常、不停地變動。個體的行動具有順從現實（即當下現狀）的傾向，但卻同時擁有對世界（即不確定的未來）的理想性、整體性的描述，儘管這樣的世界似乎是遙不可及的。基於現實與世界，行動者一般的、日常的批判和譴責，儘管充滿了對現實的理解和迫於無奈的順從，但卻同時也可能擁有基進的、對世界的理想樣貌的想像。

「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與其說是在反對或拆解批判的正當性，不如說是試圖去重構批判的基礎，並希望藉此強化批判的角色及力道，也就是說，希望透過理解「批判」運作的機制，來擴大「批判」與「現實」接觸的能力，以及藉批判來改變世界的能力（Boltanski 2009 : 223）。為此，博東斯基也建議，社會學

家們應該要重拾社會階級的概念。⁷ 他將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宰制階級視為一個「責任階級」，因為他們擁有最多的機會以及最大的生存空間，也具備最多的行動工具。其中，宰制者所擁有最強力的工具，就是「被宰制者的存在」這個事實，被宰制者的存在能夠確保宰制階級的權力運作得以可能。相反的，被宰制者一向無力改變現狀，也缺乏經濟與政治權力。面對這樣的遊戲規則，被宰制者只有兩個方式來使自己能夠承受這樣的悲慘現實：一是「相對主義的懷疑論」，允許被宰制者能夠在表面上順服規則，精神上卻質疑、違反現實。二是「對論功行賞制的信仰」，因為這樣的信仰能夠讓被宰制者相信，自己只要努力，總有一天能夠晉升到宰制階級位置；然而這樣的期待卻幾乎總是令人失望的。最後，對「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而言，所謂「批判」的計畫和改變世界的可能性，乃在於透過語意、語言的分析與運用，去激發人們對於社會變遷的想像；同時也透過對諸多權力機構的分析來客觀地展示權力分配的矛盾，藉以削弱宰制階級現實中所擁有的特殊權力。

九、結語：對批判的質疑與分析，對社會學來說是否可能？

如上所述，博東斯基的「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的企圖無疑是宏大的。但是它成功嗎？評論者恩克特（Sophie Ernct）在其文章〈與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決裂？〉（*Breaking with critical sociology? / Une rupture avec la sociologie critique?*）（Ernct 1992）之中指出：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對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的質疑，可能已經背叛了社會學這門學科長久以來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也就是企圖去「改造社會」這樣的傳統。此外，

7 當代許多法國社會學家認為，法國已經進入了「無階級社會」的階段。博東斯基反對這樣的觀點。

綜觀「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的理論內涵，經常充斥著不尋常的修辭方式，例如將意識型態形容為非理性的。恩克特認為，企圖將「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建立為一門新的典範是困難的，因為博東斯基的分析仍未跨出布赫迪厄的分析框架，其對個體行動的期待也未能拋棄布赫迪厄的分析裡頭的秉性（dispositions）和慣習等基礎概念。但不論如何，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對批判的反省，以及對批判的可能性的重新描繪，無疑仍是「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的重要貢獻。

此外，博東斯基和他的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在《論批判：解放的社會學》一書付梓之後，他的後續相關研究亦有所轉向，轉而從事關於多元價值的社會如何取得共識的問題。嚴格來說，在《論批判》之後，他的「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的工作已經完結，取而代之的知識關懷則是，人們如何相互包容、如何在充斥異己的世界之中，尋求共同生存之道的問題。儘管「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對社會批判的反省，似乎並未撼動將批判做為社會學的己任於傳統社會學之正當性，但也確實開拓了一條關於反思的全新研究道路，且豐富了批判取向的社會學的研究。

最後，或許值得我們進一步深思的還有以下這幾個問題：一、社會學對「批判」的反省，是否會導致社會學這門學科的正當性被削弱？這問題牽涉到，批判做為社會學的三大旨趣之一（Habermas 1968），批判除了是分析工具，似乎也已經成為某種社會學的固有意識型態。社會學如何反省批判，而不削弱批判的正當性，是一個十分兩難的問題。二、社會學的批判在本體論、認識論或方法論層面上的討論，由於學術產業的現實處境，似乎難以成為被大量討論的社會學次領域。學者要不就直接採用批判立場，要不就拒絕批判的立場。關於批判的有效性與局限，我們或許還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三、社會學除了積極批判世界的不公不義之外，如何在理論與現實層面，在批判的基礎上尋求善

意、真誠的集體共識，或許也是所有的社會學家能夠共同努力的方向。

作者簡介

陳逸淳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 Po）社會學博士。主要研究興趣為當代社會學理論，以及藝文相關之社會學研究。臺灣社會學界素有議題多元、包容力高的特質；做為學界中較罕有的留法學者，未來亦持續為本土學界貢獻所學專長。除了繼續從事理論研究之外，也戮力進行文化與藝術領域的新興社會學議題之相關研究。

參考書目

- Accardo, Alain, 2006, *Introduction à une sociologie critique: Lire Pierre Bourdieu*. Marseille: Agone.
- Aron, Raymond, 1955, *L'Opium des intellectuels*. Paris: Calmann-Lévy.
- Aron, Raymond, 1968, *La Révolution introuvable*. Paris: Fayard.
- Aron, Raymond, 1989, *Les étapes de la pensée sociologique*.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 Audier, Serge, 2009, *La pensée anti-68. Essai sur les origines d'une restauration intellectuelle*. Paris: La Découverte.
- Baechler, Jean, 1970, *Les Phénomènes révolutionnaires*. Paris: La Table Ronde.
- Bensaïd, Daniel, 2002, "Pierre Bourdieu, l'intellectuel et le politique." In *Contre-temps: Revue de critique communiste*, <https://www.contretemps.eu/pierre-bourdieu-intellectuel-politique/> (Date visited: May 11, 2023).
- Boltanski, Luc, 1982, *Les cadres. La formation d'un groupe social*.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 Boltanski, Luc, 1990, "Sociologie critique et sociologie de la critique." *Politix* 3(10): 124-134. DOI: 10.3406/polix.1990.2129
- Boltanski, Luc, 2008, *Rendre la réalité inacceptable*. Paris: Demopolis.
- Boltanski, Luc, 2009, *De la critique. Précis de sociologie de l'émancipation*. Paris: Gallimard.
- Boltanski, Luc and Ève Chiapello, 1999, *Le nouvel esprit du capitalisme*. Paris: Gallimard.
- Boudon, Raymond, 1971, *La crise de la sociologie*. Genève: Droz. DOI: 10.3917/droz.boudo.1971.01
- Boudon, Raymond, 1979, *Effets pervers et ordre social*. Paris: PUF.
- Boudon, Raymond, 1980, *The Crisis in Sociolog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DOI: 10.1007/978-1-349-03686-8
- Boudon, Raymond, 1990, "Les intellectuels et le second marché." *Revue européenne des sciences sociales* 28(87): 89-103.

- Boudon, Raymon and François Bourricaud, 2002, *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sociologie*. Paris: PUF.
- Bourdieu, Pierre, 1979, *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Paris: Minuit.
- Bourdieu, Pierre, 1987, *Choses dites*. Paris: Minuit.
- Bourdieu, Pierre, 1989, *La noblesse d'État: grandes écoles et esprit de corps*. Paris: Minuit.
- Bourdieu, Pierre, 1997, *Les méditations pascaliennes*. Paris: Minuit.
- Bourdieu, Pierre, 2001, *Science de la science et réflexivité – Cours du Collège de France, 2000-2001*. Paris: Raisons d'agir.
- Bourdieu, Pierre, 2012, *Sur l'État :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89-1992)*. Paris: Seuil.
- Bourdieu, Pierre and Alain Darbel, 1966, *L'amour de l'art : Les musées et leur public*. Paris: Minuit.
- Bourdieu, Pierre, Robert Castel, Jean-Claude Chamboredon and Luc Boltanski, 1965, *Un art moyen : Essai sur les usages sociaux de la photographie*. Paris: Seuil.
- Bourdieu, Pierre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1964, *Les héritiers*. Paris : Minuit.
- Bourdieu, Pierre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1970, *La reproduction*. Paris : Minuit.
- Bourdieu, Pierre, Jean-Claude Chamboredon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1968, *Le métier de sociologue. Préalables épistémologiques*. Mouton.
- Brohm, Jean-Marie, 2004, "Sociologie critique et critique de la sociologie." *Éducation et Sociétés* 13(1): 71-84. DOI: 10.3917/es.013.0071
- Bronner, Gérald and Étienne Géhin, 2017, *Le danger sociologique*. Paris: PUF.
- Carle, Pierre, 2001, *La sociologie est un sport de combat*. C-P Productions et VF Films.
- Coenen-Huther, Jacques, 2000, "Les sociologues et la crise de l'université: peur, aveuglement ou complicité?" *Revue européenne des sciences sociales* XXXVIII-119: 89-102. DOI: 10.4000/ress.674
- Corcuff, Philippe, 2003, "Pour une épistémologie de la fragilité:

- Plaidoyer en vue de la reconnaissance scientifique de pratiques transfrontalières." *Revue européenne des sciences sociales* XLI-127: 233-234. DOI: 10.4000/ress.519
- De Munck, Jean, 2011, "Les trois dimensions de la sociologie critique." In *SociologieS*, <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sociologies/3576>. (Date visited: May 11, 2023). DOI: 10.4000/sociologies.3576
- Ernct, Sophie, 1992, "Une rupture avec la sociologie critique?" *Espaces Temps* 49(1): 33-40. DOI: 10.3406/espat.1992.3801
- Fournier, Marcel, 1996, "L'élection de Marcel Mauss au Collège de France." *Genèses* 22(1): 160-165. DOI: 10.3406/genes.1996.1378
- Frère, Bruno, 2008, "La sociologie critique de Pierre Bourdieu, le dernier structuralisme." Pp. 29-52 in *Épistémologie de la sociologie*, edited by Marc Jacquemain and Bruno Frère. Paris: De Boeck Supérieur.
- Gras, Alain (dir.), 2003, *Sociologie-Ethnologie. Auteurs et textes fondateurs*. Paris: Sorbonne.
- Gruel, Louis, 2004, *La Rébellion de 68 : Une relecture sociologique*. Paris: PU Rennes. DOI: 10.4000/books.pur.24421
- Habermas, Jürgen, 1968,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 London: Heinemann Press.
- Helibron, Johan, 2007, "Sociologie et positivisme en France au XIXe siècle: les vicissitudes de la Société de sociologie (1872-1874)."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48(2): 307-331. DOI: 10.3917/rfs.482.0307
- Leroux, Robert, 1998, *Histoire et sociologie en France*. Paris: PUF. DOI: 10.3917/puf.lerou.1998.01
- Lévi-Strauss, Claude, 1950, "Introduction à l'œuvre de Marcel Mauss." in *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 edited by Claude Lévi-Strauss and Marcel Mauss. Paris: PUF.
- Mauger, Gérard, 2002, "Politique de l'engagement sociologique." *Mouvements* 24(5): 53-59. DOI: 10.3917/mouv.024.0053
- Mauss, Marcel, 1928, "Introduction." Pp. 505-509 in *Œuvres*, tome 3.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 Passeron, Jean-Claude, 1982, "L'inflation des diplômes. Remarques sur l'usage de quelques concepts analogiques en sociologie."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23(4): 551-584. DOI: 10.2307/3321659